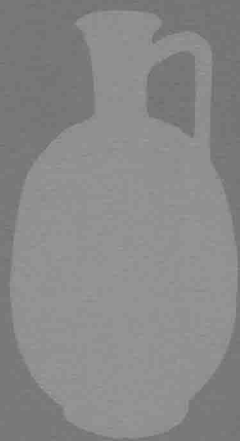


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

熊昭明◎著



文物出版社

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

熊昭明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 / 熊昭明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10-5860-0

I. ①汉… II. ①熊… III. ①文物—考古—研究—合浦县—汉代
IV. ①K87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2264号

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

著 者：熊昭明

责任编辑：杨新改

封面设计：李 红

责任印制：苏 林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75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0-5860-0

定 价：180.00元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Hepu Port in the Han Dynasty

Xiong Zhaom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江海相连：合浦港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代序）

历经 60 年的合浦汉墓发掘以及自 2002 年以来展开的大浪汉城址和草鞋村汉城址发掘，不仅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居址、码头之类的重要遗存，更为难得的是从中提供了大量反映汉代合浦港的历史信息。作为近 20 年来合浦汉墓、汉城址发掘工作领队，熊昭明在历年田野考古的基础上，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思考。现在，他将其主要的学术资料和重要的学术观点凝集成这本《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昭明特嘱我为之作序，我是非常乐意的。

众所周知，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这不但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得到了考古实物的印证。合浦借紧邻东南亚、江海相连等自然地理之便，很早就开始了海外交往，至汉武帝时，更是正式开通一条从这里出发的官方远洋航线。航线始自合浦郡的徐闻、合浦两港，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之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合浦都是两广进入交州的枢纽之地，中原入交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大都以合浦为中转站。历年合浦港的考古发现，最为引人瞩目之处，自然是汉墓出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若干文物，尤其以各种精美的珠饰、玻璃器、波斯陶等，最具浓郁的外域特色。两城址的发现也很重要。城址不但揭示了合浦汉代聚落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墓葬群一起，还可对汉代合浦社会做出初步复原，且早期的港口往往与城连为一体，因而对于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昭明为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合浦汉墓出土的这批考古资料，做了许多前期积累。除按照考古学的通则以考古报告、简报的形式尽可能客观、详细地公布考古材料之外，他还通过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李青会博士之间的合作，对合浦汉墓中出土的珠饰进行了测试分析。这项工作不是用所谓“科技考古”来装点门面，而是考古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形成的真正密切的合作：昭明选取珠饰样品供李

青会做成分测定之后,一同根据出土背景进行考古学综合分析,探寻其源流,形成他们2011年合作出版的《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一书以及其后发表的多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这些形形色色的珠子,既有直接从外域传入,也存在不同地区仿制的,不同的原料、工艺和烧制方式与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珠联璧合,确实让人透过这些“蕞尔小物”看到了当时人类文明交往的“大千世界”。

昭明并不满足于他既有的研究成果,一直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置于时空背景更为宏大的中西海路交往中探究。为此,他和四川大学吕红亮、赵德云等青年学者合作,着手收集、翻译同一时期东南亚、南亚地区历年来发表的重要考古资料,将其与合浦汉墓出土文物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昭明还注意到,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虽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但以汉文化为主体,还与同时期两广、两湖、江浙、西南等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联系,甚至影响到合浦与内陆地区陆上交通的若干方面,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是统一的汉帝国背景之下各个区域文明之间文化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更为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的重要的考古学标志之一。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都有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所进行的推论言之有物,持之有理,令人信服,既体现出考古工作者严谨、认真、客观、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也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

带着长期田野考古实践的问题关注,也带着不懈追求的学术理想,昭明给自己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他从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毕业之后,经过在广西考古工作的多年历练,已经成为一位在我国考古工作战线稳健、成熟的学术骨干,获得了多项荣誉,按时下的某些标准而言,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某一天他决定报考四川大学考古学我的博士研究生,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我曾有好几位在职博士生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最终选择了放弃攻读。所以,我慎重的告诫他,这条路看似坦途,实则难走。他虽表态不多,但却意志坚定,连续两年复习迎考,最后进入到四川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和其他同学相比,他的年岁稍长,但却充满智慧和幽默感,很快和大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还给师弟师妹们提供了许多学业上的帮助。最为令我惊喜的是,他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三年修完了全部课程,发表了多篇高质量文章,最后撰写出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顺利通过了答辩,是我所指导的在职攻博学生当中,为数极少的几位如期获得学位者之一。

但他成长的脚步似乎从未停留。离开川大之后,他又继续推进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更为充实和丰富了合浦港的研究资料,从总体上进行了

更多的梳理和拓展，将该研究置放于“一带一路”这个当前重大的语境下加以思考和理解，形成今天这部学术专著奉献于社会。可以肯定，我们从这部著作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昭明学术思路的发展、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学术理念的形成，已经超越了对考古学对象静态的物质性的观察层面，而渐入对其背后人与社会、物质与文明、考古学与思想史等诸多层面的思考境界。当然，这并非说他的这些观点和认识都已成定谳，而是对于这种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路径和价值取向，我是表示赞成和鼓励的。

在昭明的这部新作即将付梓之际，写下上面的这些话，也算是我的一点衷心的祝贺之辞。其实我知道，他脚下的路还很长，或许还会有许多艰难和困扰，但我也坚信，他不会停下他的脚步，因为考古的路，充满未知，却正因为如此，更富有魅力，在江河与海洋之间，连接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

霍 巍

2018年4月27日写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目 录

江海相连：合浦港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代序）	霍巍 / 1
第一章 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1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2
第二节 航线的考古学观察	4
第三节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与历史地位	20
第二章 合浦港相关城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	24
第一节 大浪汉城址	25
一 城墙、城门与护城河	26
二 城内堆积及建筑遗迹	27
三 西门外码头遗迹	27
四 出土遗物	28
五 城址的年代与性质	30
第二节 草鞋村汉城址	33
一 汉代遗存及其分期	35
二 城址勘探与城墙解剖	43
三 城址的性质	44
第三节 城址与港口的关联	47

第三章 合浦汉墓研究	50
第一节 以往发掘与研究	50
一 发掘简况	50
二 以往研究	56
第二节 合浦汉墓的分期	64
一 西汉早期	64
二 西汉中期	65
三 西汉晚期	66
四 东汉早期	67
五 东汉晚期	68
第三节 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	69
一 发展演变脉络清晰	69
二 显示多种文化因素的融合	70
三 出土大量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75
第四章 合浦汉墓出土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76
第一节 黄金杂缯	76
一 黄金	76
二 杂缯	78
第二节 明珠、璧流离	79
一 明珠	79
二 璧流离	81
第三节 奇石异物	90
一 石榴子石	91
二 肉红石髓、玛瑙与蚀刻石髓珠	94
三 水晶	100
四 绿柱石	102
五 琥珀	104
六 金饰	106
七 绿松石	110

八 包金铜珠	111
九 香料	111
第四节 非贸易品	113
一 波斯陶壶	113
二 铜钹	115
第五章 汉代合浦外来文化因素的植入	120
第一节 胡人俑的艺术创作母题	120
第二节 羽人座铜灯与羽人形象	122
第三节 钵生莲花器与佛教传入	124
第四节 叠涩穹隆顶的源流	128
第六章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辐射	131
第一节 对广西地区的直接影响	131
第二节 中国内陆的考古发现及海上丝绸之路辐射	136
第三节 沿东南沿海向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延伸	139
第七章 合浦港兴衰及其衰落的历史启示	143
第一节 合浦港的兴起和繁荣	143
第二节 合浦港的衰落	147
第三节 合浦港衰落的历史启示	149
第八章 结语	153
附表	156
附表一 合浦汉墓出土玻璃器一览表	156
附表二 合浦汉墓出土石榴子石珠饰一览表	169
附表三 合浦汉墓出土肉红石髓珠、玛瑙和蚀刻石髓珠饰一览表	170
附表四 合浦汉墓出土水晶和绿柱石珠饰一览表	178
附表五 合浦汉墓出土琥珀珠饰一览表	184
附表六 合浦汉墓出土金饰一览表	188

附：汉代合浦港考古侧记	192
主要参考文献	202
后 记	216
英文提要	218

第一章 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出版《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首次使用“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词，形容在张骞出使西域古道基础上形成的中西贸易通道^[1]。此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道运往西方，也经由海道。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1903年出版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国的丝绸贸易有两条商道：一是通过粟特国的陆路，另一是通过海路到达印度沿岸^[2]。这条海路在古印度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据季羨林研究，在巴利语文献，即国王弥楞陀（Menandros，公元前125~前95年）和龙军和尚（Nagasena）的对话录“那先比丘经”中，实际上提到了一些关于印度货船远行至中国的事情^[3]。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使用，则始于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的《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4]。三杉隆敏根据中国陶瓷的海上运输和贸易分布提出这一概念，尽管他并未具体从历史学、考古学角度给予明确的学术定义，但“海上丝绸之路”简明易懂，很快为媒体和学术界所接受，并推广使用开来。

在我国，中西古代海上交通的研究由来已久^[5]，但冠之以“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以陈炎^[6]、常任侠^[7]等为代表。自1987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项目的十年规划，并于1990年10

[1] Richthofen, F.F. 1877.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ume 1. 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 pp.496-501.

[2] 爱德华·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08页。

[3]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7页。

[4] 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めぐっ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史》，大阪：创元社，1968年，第6~9页。

[5] 较早有冯承钧1937年出版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系统辑录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编著、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

[6]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7] 常任侠：《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

月~1991年2月间,开展有中国学者参与的从意大利威尼斯至我国广州的海路考察活动,还在福建泉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1],中国学术界自此掀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这一阶段,陈高华^[2]、刘迎胜^[3]、陈炎^[4]等,对海上丝绸之路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进入新千年,特别是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高潮迭至,多地相继召开学术研讨会,成立研究机构,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社会各界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给予了持续的高度关注^[5]。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纵观学者的研究,不管角度与内容如何,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都大体一致,那就是指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不过,具体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所指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上、下限问题,学术界仍存不少歧见。

古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东洋航路上,秦始皇时期就有徐福东渡入海求仙人和神药的传说,有秦末齐人曾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适韩国”以及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等记载,《汉书》和《后汉书》中也有多处关于“倭”的记述,这些都证明了汉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6];南洋航路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也由来已久,至晚到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诸国”^[7],而且“不晚于铁器时代,南中国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跨区域商贸区之一”^[8]。至秦汉时期,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南迁路线,正被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3]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4]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5] 耿升:《2001年海上丝路研究在中国(上)》,《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2001年海上丝路研究在中国(下)》,《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2期;戚文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6]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207页。

[7]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8] Hsiao-chun Hung, Kim Dung Nguyen, Peter Bellwood & Mike T. Carson, 2013. Coastal connectivity: long-term trading networks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8:3, pp.384-404. 文中提到的铁器时代,始自公元前500年的沙莹文化。

土墩墓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其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1]。但凡上述种种,多为迁徙、战争或朝贡等,缺乏连贯性,经行路线也不固定,多无明确的贸易意愿和商品交换种类,归入考古学文化交流传播的范畴,似无不妥。

汉武帝平定南越、置合浦等九郡后,南洋航路由官方正式开通,即通常所称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佑、殿本都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2]

这段文献所述的年代当为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主要内容是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海路交往和贸易情况,尤以使团的航线、航程和交易商品等较为详尽。我们据此也可归纳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方面特征:一是线路相对固定。从北部湾畔出发,大致沿岸前行,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二是官方主导,民间参与。黄门隶属于少府,由其下的“译长”率领,也有部分敢于冒险的商人——“应募者”加入;三是主要进行商贸活动。携去“黄金杂繒”,买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是双向行为,而非单方面输出;四是伴随着国家间的朝贡和外交活动。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但言王莽先“厚遗”,才“令遣使献生犀牛”,亦未提及对其进行册封等,故与严格意义上的朝贡制度有所不同;五是和平之路。沿途所经国家提供食物和陪同人员,甚至出现“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友好场景。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上、下限,也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海上丝绸之路的上限,有史前说、先秦说、秦汉说、中唐说等诸多观点^[3],但正如陆上丝绸之路(或称“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以张骞受命“凿空”西域为正式开通,上述汉武帝开通从北部湾地区出发的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象征,官方参与主导,路线相对明确固定,

[1]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2]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3] 冯定雄:《新世纪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述略》,《理论参考》2014年第9期。

且对日后中外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年代上限。从这一意义上说,合浦郡的徐闻、合浦两港,无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西贸易的平等关系被严重扭曲,可视作其下限^[1]。在这一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单就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而言,从汉代的丝绸到唐代晚期开始的陶瓷,差别很大,时代背景、航线、贸易对象、文化交流内容等亦不尽相同。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分期过细而缺乏必要性和充足依据的情况下,依笔者管见,在其前冠以朝代,如“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等表达,更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当时中西贸易的特性。

第二节 航线的考古学观察

学术界对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解读,最大的争议,是沿线港口和国家现今的地理位置,正谓“所难知者仅为汉使所历之国,诸国名经两千年之传写,难保毫无讹误,故历来诸考据家几人持一说”^[2]。

较早开始考证的是冯承钧,他综合藤田丰八、费琅等学者的观点,认为“都元国”在马来半岛,“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谶离国”在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的悉利城,“夫甘都卢国”在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的蒲甘城,“黄支国”在印度南部东海岸建志补罗的 Conjeveram。回程经过的“皮宗”,在今马来半岛的 Pisang 岛。至于“已程不国”,冯承钧和费琅均无考,藤田丰八认为是印度南部东海岸的古里港,但后代的学者多倾向于在今斯里兰卡^[3]。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韩振华^[4]、岑仲勉^[5]、周连宽^[6]等著名学者也曾对这些古国作过全面考释。

众多观点中,主张谶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在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的意见不在少数,因关系到航线的两个重要节点,尤应予以重视。1945 年,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发文,

[1] 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年。见“前言”部分。

[2]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影印本(原书 1937 年出版),第 2~3 页。

[3] 苏继庠:《汉书地理志已程不国即锡兰说》,《南洋学报》第 5 卷第二辑(1948 年),第 1~4 页。

[4]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 年第 2 期。

[5] 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 年第 4 期。

[6] 周连宽:《汉使航程问题——评岑韩二氏的论文》,《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 年第 3 期。

认为马来半岛中部狭窄地带有若干可以便捷横断的地点,海路未必是唯一通道^[1]。稍晚,许云樵明确提出,“步行可十余日”是指弃船步行通过克拉地峡,谶离国与夫甘都卢国应分别位于地峡东西两侧^[2]。此后,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3]等学者沿用了这一观点。

上述学者的考据,以文献释读见长,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海洋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个别学者还运用了考古资料加以佐证,但受制于当时的考古发现以及学者的学术背景,偶存资料运用不当的情况。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通过地层学、类型学等手段,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的实证学科,而沿线港口和古国作为高级聚落形态,必定有较大型的墓葬群、居住址或城市遗存,因此,从我国北部湾地区及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出土资料入手,通过物化的遗迹和遗物,厘清与海上丝绸之路记述年代相当的“点”,进一步连“点”成“线”,或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港口徐闻、合浦和日南,古国先后有都元、邑卢没、谶离、夫甘都卢、黄支、已程不和皮宗。对于沿线古国的政体,目前我们尚不明晰,芒甘(Pierre-Yves Manguin)甚至提出许多东南亚国家是城市国家,而非领土国家^[4]。但不管如何,那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港口城市,被认为是古代“全球化”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从考古发现出发,力争对它们现今的地理位置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 徐闻

徐闻为合浦郡属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5]港口的职能是囤积进出口货物,所设的“左右候官”,应是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管理外贸货物、稽征进出口商品税费等的官员,

[1] 转引自周长山:《日本学界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2期。原文载:《南海に关する支那史料》,东京:生活社,1945年,第18~20页。

[2] 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南洋学报》第5卷第二辑(1948年),第26~37页。

[3] Paul Wheatley, 1961.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 D. 1500*. Kuala Lumpur: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pp.8.

[4] Manguin PY, 2000. City-states and city-states cultures in pre-fifteen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 In boo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birty City-state Culture*. Edited by MH Hansen. Copenhagen: Historisk-filosofiske Skrifter, R. Danish Acad. Sei. Lett. pp.409-416.

[5]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7页。

而与西北边塞的候官全面履行军事、行政和司法职能^[1]，应有所区别。黄启臣、阮应祺、张荣芳、吴松弟等学者还从历史学角度对徐闻港的重要历史地位等予以了阐述^[2]。

徐闻没有内河与内陆相通，其功能主要是作为沿海航线的补给港，货物的集散能力有限，因而决定了港口的规模不大，考古发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1973年冬至1974年春，广东省博物馆在琼州海峡北面的华丰村、红坎村和槟榔湾村三地发掘了51座东汉墓，并认为汉徐闻城在华丰村西南3千米处的七旺村一带。墓葬出土了珠饰308颗，包括“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3]，多与海外贸易相关。不过，七旺村一带并没有更早的遗存发现，无法显示其与西汉徐闻港之间的关联性。

1993年10~1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前期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仕尾村、二桥村和南湾村一带的汉代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墓葬、房址、水井等，出土器物以陶器和瓦类为主，也有极少的铜器、铁器和石器^[4]。发掘者把二桥村遗址年代的上、下限分别定在西汉早期和中期。但从2A层出土的遗物特别是建筑材料来看，与合浦草鞋村遗址所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器物极为相似，当然，不排除这一带开发较早的可能性，但与之比对的粤东地区遗址和广州汉墓，应仍存一定的滞后性。二桥村遗址地处海湾，发掘者随后撰文认为，这一带即徐闻港所在^[5]。

汉徐闻县地域广大，辖今整个雷州半岛。作者曾数度前往调查，其中在遂溪县杨柑镇、流入北部湾的杨柑河两侧，分布着多个几何印纹硬陶遗存，与合浦大浪汉城址等发现基本相类，年代也应为西汉早、中期，这些发现很值得重视。1984年，在遂溪县郊江湾村发现一处南朝时期的窖藏金银器，出土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约20枚和1件莲瓣银碗等^[6]，或能从侧面说明遂溪与海外交往的传统。我们还注意到，二桥遗

[1] 方孝坤：《侯官职能述补》，《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

[2] 黄启臣：《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阮应祺：《汉代徐闻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5] 崔勇：《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

[6]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